



陕西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上冊）

「明」呂柟著

米文科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上冊）

「明」呂柟著 米文科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關學文庫》組織工作委員會

主 任 趙正永

副 主 任 江澤林 王莉霞 張豈之 陳國強 張祖培

執行副主任 徐 曄

委 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上官吉慶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華 江澤林 李 浩 李明遠 岳 亮

姜 鋒 馬 來 桂維民 徐 曄 陸柯倫

陳國強 郭大爲 郭立宏 張小寧 張社年

張祖培 張豈之 彭樹智 董 軍 趙正永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閻曉宏 權 儉

《關學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張 豈 之

副 主 任 趙 馥 潔 薛 保 勤

執 行 副 主 任 徐 曄 馬 來

總 主 編 劉 學 智 方 光 華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美鳳 方光華 米文科 李似珍 李穎科

何惠昂 林樂昌 郝潤華 袁志偉 馬來

徐曄 高彥平 郭文鎬 陳戰峰 孫學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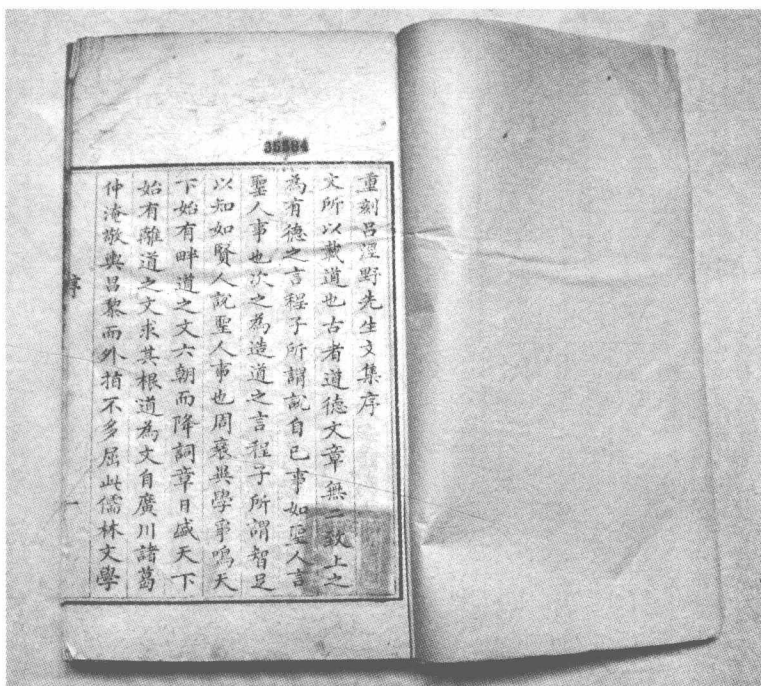
曹樹明 許寧 張波 張萍 張雄

張世民 張豈之 楊建輝 路毓賢 趙瑞民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韓星 魏冬



《呂枏集·涇野先生文集》清道光十二年楊浚刻本



《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清道光十二年楊浚刻本

總序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宋鳳翔府郿縣（今陝西眉縣）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張載出身於官宦之家。祖父張復在宋真宗時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死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時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死後，張載與全家遂僑居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講學，世稱橫渠先生。他的學術思想在學術史上被稱為橫渠之學，他所代表的學派被後人稱為「關學」。張載與程顥、程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可以說，關學是由張載創立并於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

關學基本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中國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和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於北宋、下迄於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中理學的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關學文庫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僅就關學、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關學的思想特質、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等談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一、作為理學重要構成部分的關學

衆所周知，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與新階段，一般被稱為新儒學。但在新儒學中，構成較為複雜。比較典型的則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重要一支來作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

「濂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其中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及其影響並不限於某個地域，而成為中華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即宋代理學。

根據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以及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對記載關學思想的理解、評價和吸收，張載創始的關學本質上當是理學，而且是影響全國的思想文化學派。過去，我們在編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學史上冊的時候，在關學學術旨歸和歷史作用上曾作過探討，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古代學術史考鏡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張載後學，如藍田呂氏等，在張載去世後多歸二程門下，如果拘泥門戶之見，似乎張載關學發展有所中斷，但學術思想的傳承往往較學者的理解和判斷複雜得多。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入及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中國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它開啟了清初王船山學術的先河。

關學文庫所遴選的作品與人物，結合學術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關學編及關學續編、關學宗傳等，均是關中理學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張載，下至晚清的劉光蕢、民國時期的牛兆濂，能夠反映關中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學術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與歷史上的關中叢書相比，這套文庫更加豐富醇純，是對前賢整理文獻思想與實踐的進一步繼承與發展，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二、張載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土後，有所謂「三教合一」說，主張儒、道、釋融合滲透，或稱三教「會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並舉的文化現象。當歷史演進到北宋時期，由於書院建立，學術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場所，從而促進了學人的獨立思考，使

他們對儒家經學箋注主義提出了懷疑，呼喚新思想的出現，於是理學應時而生。理學主體是儒學，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將它們融合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理學產生時起，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學學派。比如，在「三教融合」過程中，如何理解「氣」與「理」（理的問題是迴避不開的，華嚴宗的「事理說」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響）的關係？理學如何捍衛儒學早期關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觀點，又不致只在「善」與「惡」的對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與社會及個人有何關係？君子、士大夫怎麼做才能維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又能堅持修齊治平的準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中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一個統一的看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加以解決。宋代理學的產生及不同學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發展歷史的寫照，因而理學在實質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時朱熹閩學各有自己的特色。作為理學的創建者之一，張載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在對儒學學說進行傳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北宋時期，學者們重視對易的研究。易富於哲理性，他通過對易的解說，闡述對宇宙和人生的見解，積極發揮四書義理，並融合佛、道，將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載與洛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等人曾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學術思想上相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張載來到京師汴京，講授易學，曾與程顥一起終日切磋學術，探討學問（參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張載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為二程表叔，二程對張載的人品和學術非常敬重。通過與二程的切磋與交流，張載對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術思想充滿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因為張載與程顥、程頤之間為親屬關係，在學術上有密切的交往，關學後傳不拘門戶，如呂氏三兄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師道、游師雄、潘拯、李復、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在張載去世後一些人投到二程門下，繼續研究學術，也因此關學的學術地位在學術史上常常有意無意地受到貶低甚至質疑（包括程門弟子的貶低和質疑）。

事實上，在理學發展史上，張載以其關學卓然成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理論建樹，這是不能否定的。反過來，張載的一些觀點和思想也影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對後來的程朱學說及閩學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張載依據易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基本點上和易的原有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虛即氣」的觀點，認為沒有超越「氣」之上的「太極」或「理」世界，換言之，「氣」不是被人創造出的產物。又由此推論出天下萬物由「氣」聚而成，物毀氣散，復歸於虛空（或「太虛」）。在氣聚、氣散即物成物毀的運行過程中，才顯示出事物的條理性。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這個觀點去看萬物的成毀。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間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處於宇宙之中。由於三者都是氣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歸根到底，萬物與人類的本性是一致的。進而認為，人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鰥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這裏所表述的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與張載有別，他們通過對張載氣本論的取捨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關思想，建構了「萬理歸於一理」的理論體系。在人性論方面，二程在張載人性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論。二程贊同張載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二程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瑕的；「氣質之性」是氣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氣稟決定，稟清氣則為善，稟濁氣則為惡，正因為氣質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氣」的侵蝕而出現「氣之偏」，因而具有惡的因素。在二程看來，善與惡的對立，實際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朱熹將張載氣本論進行改造，把有關「氣」的學說納入他的天理論體系中。朱熹接受「氣」生萬物的思想，但與張載的氣本論不同，朱熹不再將「理」看成是「氣」的屬性，而是「氣」的本原。天理與萬事萬物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朱熹關於「理

一分殊」的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說：「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論包括一理攝萬理與萬理歸一理兩個方面，這與張載思想有別。

總之，宋明理學反映出儒、道、釋三者融合所達到的理論高度。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於兩宋時期。張載開創的關學爲此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船山之學繼承發揚了張載學說，又有新的創造。

三、關學的特色

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這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樸實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特別是呂大臨。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關學學者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

其次，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顥，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操志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

最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

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他注意對物理、氣象、生物等自然現象做客觀的觀察和合理的解釋，具有科學精神。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重視自然科學。三原學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經典，強調用心求學，求其「放心」，用心考證，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獨立主見的治國理政觀念。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三呂」、呂枏、馮從吾、李顥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四、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

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在大陸已成孤本（如韓邦奇的禹貢詳略、李因篤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殘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殘本，現重慶圖書館存有原書，國家圖書館僅存膠片；收入的南大吉詩文，搜自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周雅續）。即使晚近的劉光蕢、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亦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關中叢書（邵力子題書名），但該叢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是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陸續出版，這些僅是關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統梳理關學學術文獻仍系空白。

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

現在將要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內容組成，共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餘萬字。

一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上重要文獻進行搜集、搶救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重要學人二十九人，編

訂文獻二十六部。這些文獻分別是：張子全書、藍田呂氏集、李復集、元代關學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張舜典集、馬理集、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呂柟集、涇野子內篇、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韓邦奇集、南大吉集、楊爵集、馮從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顥集、李柏集、李因篤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劉光賁集、牛兆濂集以及關學史文獻輯校。

二是學術研究類，其中一些以「評傳」或年譜的形式，對關學重要學人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郿縣張載、藍田呂大臨、高陵呂柟、長安馮從吾、朝邑韓邦奇、藍屋李顥、郿縣李柏、富平李因篤、鄠縣王心敬、咸陽劉光賁等學人，共十一部。它們分別是：張載思想研究、張載年譜、呂大臨評傳、呂柟評傳、韓邦奇評傳、馮從吾評傳、李顥評傳、李柏評傳、李因篤評傳、王心敬評傳、劉光賁評傳等。此外，針對關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與思想學術演變歷程進行研究，共三部。這些著作分別是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

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文獻整理是文庫的重點內容和主體部分。

關學文庫係「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文庫的組織、編輯、審定和出版工作在組織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負責。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對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後世的國家和省級重大文化精品圖書高度重視，親自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自始至終關心支持文庫的編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江澤林、副省長 王莉霞和省政府秘書長 陳國強等對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給予悉心指導；原陝西省新聞出版局局長 薛保勤、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 趙馥潔，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主任張祖培對文庫的策劃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庫歷時五年編撰完成，凝結著全體參與者的智慧和心血。總主編劉學智、方光華教授，項目總負責徐晔、馬來同志統籌全書，精心組織，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協力攻關，精益求精，體現出深沉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責任感；他們孜孜矻矻，持之以恆，任勞任怨，樂於奉獻，以古人為己之學相互勉勵，在整理研

究古代文獻的同時，不斷錘煉學識，砥礪德行，努力追求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學術品格。出版社組織專業編輯、外審專家通力合作，希望盡最大可能提高該文庫的學術品質。作為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我謹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迫、經驗不足等原因，文庫書稿中的疏漏差錯難以完全避免。希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使用時加以批評指正，以便日後進一步修訂，努力使該文庫更加完善。

張豈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卒於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

武宗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呂柟舉進士第一，歷任翰林院修撰、解州（今山西運城）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等職。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致仕回鄉，居家三年而卒，年六十四。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呂柟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涇野子內篇、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涇野先生文集、涇野先生別集、十四遊記、高陵縣志、解州志、宋四子抄釋、詩樂圖譜等（詳見點校本涇野子內篇附錄）。

從思想淵源上來看，呂柟之學出自明初河東的薛瑄。呂柟曾從學於渭南的薛敬之，而薛敬之又師從周蕙，周蕙之學則來自薛瑄的門人李昶和私淑弟子段堅，因此在學問方向上，呂柟始終堅持朱子學的立場，強調格物窮理、知先行後。除朱子學之外，呂柟還繼承了關學讀經重禮、重視氣節的傳統，並開始由理學而轉向先秦孔孟的仁學。

具體來說，在理氣觀上，呂柟反對朱子的「理氣二分」，而主張「理氣非二物」（涇野子內篇卷十三）。他認為：「天命只是個氣，非氣則理無所尋著，言氣則理自在其中，如『形色天性也』即是，如耳目手足是氣，則有聰明持行之性。」（四書因問卷二）這就是說理只是氣之理、氣之性，因此人性也沒有所謂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義理之性即在氣質之性中。從這裡可以看出，呂柟的思想已經由程朱的理本論而轉向了「以氣為本」的氣學。正是理氣觀上的這種轉變，使呂柟非常重視在氣上求理，因此他的理學思想也主要體現在修養工夫上，而對形而上的理氣、心性等問題缺乏深入的討論。

在工夫修養上，呂柟繼承了朱子「涵養省察」與「格物窮理」同時並進，不偏一邊的思想。他一方面要求學者要格物窮

理，強調知對於行的邏輯在先性，所謂「須知得何者是天理，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个甚么」（涇野子內篇卷十五）。故「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涇野子內篇卷十六）。另一方面又指出道德的修養不能單靠一「格物」便能完成，同時還需要有涵養省察的工夫並見之於躬行。但呂柟不同意朱子把「涵養」與「省察」分爲兩種不同的工夫，分別屬於「存天理」與「遏人欲」兩邊，而認爲「戒慎恐懼」與「慎獨」只是一個工夫，「才省察便涵養，才閑邪便存誠，才克己便復禮，實非有兩事也」（四書因問卷二）。儘管如此，呂柟還是比較重視在念慮初起時做工夫，亦即「慎獨」。除了內在的心性修養之外，呂柟工夫論上的另一個特點便是強調「致曲」。呂柟所說的「致曲」，主要是指從細微、周全處着手，使事物無不合其宜，「曲是纖悉委曲處皆要推而致之，使無遺欠」（四書因問卷二）。在他看來，「致曲」工夫是無處無之的，就像孟子說的「必有事焉」一樣。同時，「致曲」工夫也就是「明誠」盡頭，即工夫本身就有意義，而不只是爲了體證形上的天理。

當然，呂柟對工夫實踐的重視，除了與他重氣的思想相一致外，還有另一個方面的原因，就是當時學者或者離開具體的人事而高談心性，開口便說「一貫」；或者沉溺於辭章記誦，陷入「支離」之中。對於前者，呂柟指出：「今之學者，平日都能道仁義氣節。及遇小小利害，便改移了，何以爲學！由是知高談者之無益也。」（涇野子內篇卷七）又說：「人只是厚重篤實，人便信他是有德行的；若徒高談闊論，其爲害亦不細，雖謂之邪說可也。」（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七）因此他反對專以理氣、心性爲道學，認爲「性、命、理、氣固要講明，必措諸躬行，方是親切，性命自在其中，庶不爲徒講也」（涇野子內篇卷十）。而所謂「一貫」，也是先需要逐事磨練，有許多工夫在內，並非一朝一夕便能達到，「曾子不知苦過多少事，孔子後方與他說一貫。今無孔子之質，又無曾子之學，遽要一貫，豈非妄想」（涇野子內篇卷八）。對於後者，呂柟則指出：「學者雖讀盡天下之書，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體驗見之躬行，於身心何益，於世道何補！」（涇野子內篇卷十）強調「多識前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涇野子內篇卷十五）。正因爲如此，呂柟提出了「君子貴行不貴言」（涇野子內篇卷一）的口號，並貫徹終生，所以時人對呂柟的評價也多以「重行」爲主，如徐階稱其「反身克己，於其日用常行者

實致力焉，其他未嘗及也」(涇野先生集序)。劉宗周也說：「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遭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發千鈞。」(明儒學案師說)

除了朱子學之外，呂柟還繼承了關學讀經重禮、重視氣節的傳統。「以禮爲教」是張載思想的一個顯著特色，後來成爲關中理學的一個傳統學風，一直延續到明、清。明末的劉宗周就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明儒學案師說)清初的張履祥也說：「關中之教，以知禮成性爲先。蓋學禮則功夫有準的，身心有所持守，自初學以至成德，徹上徹下，一以貫之而已。」(楊園先生全集卷五)呂柟也非常重視對禮的學習與踐行，「嘗語學者當先學禮」(涇野子內篇卷十)。他認爲學禮能夠檢束身心，防止「非辟之心」的產生，「若人無禮以提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涇野子內篇卷七)，並指出：「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辟之心無自而入。」(涇野子內篇卷七)此外，禮還能夠經世，「知禮可以復民性」(涇野子內篇卷十六)，故呂柟又比較注重禮的教化功能，用禮來移風易俗，如他在山西解州解梁書院講學時，一方面挑選民間俊秀子弟入書院歌詩習禮，並請人在每月朔望講讀會典諸禮，另一方面則大力推行呂氏鄉約、朱子家禮等。而在擔任北京國子監祭酒時，則讓諸生「每月習禮二次，每日歌詩一次」(涇野子內篇卷二十四)。對於經學，張載曾強調「六經直是少一不得」(經學理窟義理)，而後來的關中理學家也大都比較重視經學的學習，這「重經」的特色在呂柟身上也有較多的體現，他不僅有許多關於經學研究的著作，如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和禮問等，同時在日常講學和學校教育中也大力強調經學的學習。但呂柟對經典的重視，卻不只是爲了科舉考試，而是將經學看作是改變士風士習的「良藥」，他說：「夫士習易於趨卑，猶水之易於就下，何也？蓋各就其性之所近，以爲所好而進耳。是故高者耽玄，卑者溺俗，治詞者忘物，榮名者廢實，喻利者損義。此五者，多士之病也，其藥石皆具於六經。是故經學者，士子之隄坊也。」(涇野先生文集卷七贈張惟靜提學序)因此呂柟指出，讀經的目的是爲了修身、躬行，將經書中的道理運用到個體和社會實踐中去，而不能只爲了科舉功名和停留於口耳記誦，他說：「看經要體認玩索，得之於心，見之於行才是。若只讀了，卻是記誦之學，雖多亦奚以爲！」(涇野子內篇卷二十七)即使是科舉，呂柟也指出舉業與德業並不是